

#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宗教学探究\*

杨 洁

**提 要：**从历史进程上看，我们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并由此指导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创立。在理论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为中国特色宗教学传播理论知识、培养专业人才提供有力支撑。就政策而言，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历代领导人的发言都鼓励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关专业，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杨洁，哲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特色宗教学 社会道德 宗教政策

进入 21 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在逐渐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迎来了新的发展与繁荣。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我国已经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谱写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发展的新篇章。不少学者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专著和文集，为研究世界各大宗教和我国的宗教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宝贵资料，并且中国特色宗教学也在不断培养宗教人才，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宗教传统文化，为党和国家发挥好智库作用。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既承继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得益于几代中国宗教学术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艰难探索，更离不开我国领导人及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

##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学的百年历程

从历史进程上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百年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马恩时期、苏东社会主义时期以及中国化时期。<sup>①</sup>

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宗教现象阐发了大量指导性论断，散见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乌培河谷来信》《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宗教确定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

曾说过“宗教是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②</sup>。其指向是备受封建主和贵族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民众无法反抗或不愿反抗，只得借助宗教获得精神慰藉，而宗教慰藉就如同吸食“鸦片”<sup>③</sup>一样具有缓解现实痛苦的功效。这表明维护旧有伦理纲常的宗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其相对独立性和滞后性。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马克思迅速结束了对宗教的批判，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批判和生产方式批判，这也表明了共产党人不会以消灭宗教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宗教不过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19 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宗教的界定。而 19 世纪中叶却出现了以布朗基主义者和杜林为代表的“左”倾运动，他们妄图通过行政命令和警察手段禁止宗教以炫耀其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从 1874 年的《流亡者文献》中可以看出布朗基、巴枯宁主义者对宗教的主张——“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sup>④</sup>。而杜林表现得更为激进，他甚至说：“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sup>⑤</sup>恩格斯则猛烈抨击了这些把无神论推至极端的主张，他认为杜林、布朗基、巴枯宁主义者都犯了“左”倾的错误，因为直接取缔宗教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仅是在革命绝境时不得不采取的另一种信

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彻底取缔宗教的做法反映了俾斯麦文化下集权专制的本质，与杜林、布朗基等人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sup>⑥</sup> 所以通过取缔一切宗教的极端方式不会使社会提前迈入共产主义。同时，用极端无神论取代宗教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完全忽略了无神论与宗教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无神论作为对宗教的单纯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sup>⑦</sup>。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神论和宗教始终是对立统一的存在，他们与杜林、布朗基等人的立场完全相反。如果仍不加分别地效仿杜林对宗教的极端见解，那么将严重偏离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念。

在第二阶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宗教的论断被前苏联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宗教论断即《反杜林论》所言：“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sup>⑧</sup> 这里完整表述了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条件，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宗教事务和展开宗教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苏联第一次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宗教问题，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得以具体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形成新的发展。<sup>⑨</sup>

前苏联政府在宪法上明文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并于1917年发表《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所有公民无论其有无宗教信仰或何种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权利。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等政策。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宣传和社会改造，前苏联的宗教逐渐从政治中摆脱出来，走向了同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道路——“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sup>⑩</sup>。在前期坚持贯彻以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宗教政策下，宗教曾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但其后，前苏联政府颁布的《苏俄刑法典》（1921）却开始严格限制宗教活动的范围。赫鲁晓夫上台后甚至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关闭了三分之二的教堂、神学院和修道院，粗暴地干涉教会的正常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便“反

宗教宣传”的概念已经停止使用，但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没有真正付诸实践。前苏联政府忽左忽右的宗教政策早已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情感，为日后加速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虽然马克思的宗教思想在前苏联形成了系统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但苏东剧变则表明前苏联所表现出来的宗教观存在着严重问题，带来了以下四点教训：1. 对宗教发展规律缺乏清醒认识，错误地主张以行政方式促使宗教消亡；2. 混淆了宗教问题与阶级问题；3. 对宗教问题的民族性和群众性特征认识不足，伤害了群众的宗教情感；4. 政教关系、群教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甚至敌对的状态。<sup>⑪</sup>

有鉴于此，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过程中，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科学地研究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将长期是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建国之初，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在做统战工作时提出了宗教的“五性”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发展道路。<sup>⑫</sup>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把宗教问题纳入统战范畴。而“文革”时期，宗教以及宗教学的发展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直至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后，才重新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当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宗教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的基本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sup>⑬</sup> 的科学论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由此可见，从第一阶段的形成期到第三阶段发展期距今长达百余年之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得以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宗教学也有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宗教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轫于19世纪下半叶，以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在《德国作坊札记》（1867年）中把这门学科命名为“宗教学”<sup>⑭</sup> 为其开端。虽然莱伯兰（the Abbé Prosper Leblanc）和斯泰福哈根（Stiefelhagen）等人零星地使用过“宗教学”一词，但都并非在缪勒的严格界定上使用。因缪勒倡导中立的、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的比较宗教研究和宗教历史研究，于是各国的宗教学建设纷纷在缪勒设计的轨道上推进，积极探究多样化的宗教现象以及各民

族的宗教发展史。宗教学的发展至今已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其诞生之初,它就不曾是专指研究基督教神学或是宣扬迷信的学科,而是结合现象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等多门学科,以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教现象为基础,采用纵向描述、横向比较以及现象学探究和精神分析方法对人类的精神和心理展开的悬置宗教信仰的科学研究。更有学者提到宗教学是18、19世纪“启蒙精神”和“理性运动”的产物,标志着“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社会平等”的时代精神。<sup>⑤</sup>

虽然我国以前也存在许多出于自身信仰的“佛学”“道学”和“经学”研究,但是以客观科学的宗教学方式研究和比较儒释道却是在西方学科体系被系统引入中国之后才发生。而这一引入的进程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引进和翻译活动的繁盛息息相关。1897年为了响应世界“宗教学”潮流,李佳白(Gilbert Reid)在北京创办“尚贤堂”从事多宗教的比较研究;1903年“尚贤堂”在上海重建,邀请佛教、道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人物讲学,开创了我国多宗教合作开展宗教学研究的风气;1925年燕京大学神学院更名为“宗教学院”,并聘用国内知名教授,其研究领域已超越神学范畴成为中国“宗教学”的组成部分。<sup>⑥</sup>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亲自提倡并推动了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创建。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建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不久,周恩来总理做出具体批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sup>⑦</sup>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任继愈先生于1964年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国从此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专门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机构。

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完善研究体制,建立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中国民间宗教等研究室,成为全国最为集中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其培养的学术人才促成并支撑着众多高校的宗教学科和地方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198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最早成立地方性宗教研究所。1980年9月,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由教育部批准创建,是中国高校系统第一个宗教学的专业机构。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宗教学本科专业,并于7年后成立宗教研究所。1988年中央民族大学开办了宗教

学大专班。此外,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纷纷以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研究为基础创立宗教研究中心,一时间出现协同振兴“宗教学”的局面。90年代后,部分综合性大学也开始建立“宗教系”,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宗教的专业人才,还为非专业的师生普及了宗教文化知识。

通过梳理以上的历史背景可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既是历史之趋势,又是实践之必然。故而当前任务不是逆时代潮流去抨击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存在价值和继续发展的必要性,而是应该审慎地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丰富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进而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宗教学研究的中国经验。

##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理论立场

从理论特征上看,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基石和立场,这样才能体现出它“比以往的无神论都要深刻”的原因;其次,也有必要重申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性质、对象和基本内容,这样才能区别出它与一般宗教学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奋斗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复归人的本质为己任。杜林、布朗基和巴枯宁等人却采用快速消灭宗教的极端做法以实现俾斯麦式集权专制的政治目的。所以牟钟鉴先生指出,以往的无神论对于宗教只有无情地揭露,没有深刻地说明,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满足于证明神灵不存在,它还要说明为什么古往今来信神的人很多。<sup>⑧</sup>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关注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和经济基础,试图通过社会变革逐步使人从宗教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有相应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当外部的异己力量消失时,宗教才可能随之消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工作中虽然也是无神论者,却并不推行对宗教的全面防范和坚决打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当然包含着无神论的丰富内容,但其理论基石不是无神论,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保持高度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指出在本原意义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恩格斯对物质初步概括为：“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sup>①</sup>列宁作出了更全面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sup>②</sup>因此，物质应是概括世界所有层次、一切运动形态和共同属性的最抽象的范畴。但以往的无神论不直面“物质范畴”的定义，只对宗教展开精神性的否定，将“无神”作为其理论基石则无法全面地、正向阐明物质范畴在宗教理解中的基础性意义。这也就表明若想理解甚至批判宗教，则仍需回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其二，如果从哲学的高度予以清算的话，“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应该回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sup>③</sup>而非沉浸在“有神”与“无神”的空泛争论中。正是肯定了（物质）“存在”第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创立出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奠定了人民群众重要的历史地位，让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及“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路线。<sup>④</sup>若仅从有神、无神的发展史来解释人类历史，那么由于早期人类的思想行为和社会伦理都普遍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无神必然要通过不断地否定宗教来解释人类的完整历史。因此，以往无神论的批判总是根据宗教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成为一种被动的批判。这种无法彻底摆脱宗教发展史的无神论式的历史解释被马克思所遗弃，毕竟“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sup>⑤</sup>。其实，这里已经表明了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解并不是从有神与无神的角度展开的，而是集中于宗教作为社会意识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即人类社会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应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说，需要从“自身的经济关系”中解释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现象，即“最终得回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sup>⑥</sup>

所谓经济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方面最终都将体现在劳动者的物质生产生活中，所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便不能脱离对劳动者的物质生

存环境以及由此生存环境而产生的理想信念的关注。而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终极目标便是早日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在全面自由尚未达成时，劳动人民的有限自由，如信仰自由，也应当给予保障。有限的信仰自由并不仅仅出于劳动者的主观意愿，而有着由特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呈现出来的客观性根源。这就意味着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处理宗教问题、向宗教宣战、或用强制手段想使人人都变成无神论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因为要想彻底解决社会迷信和群众信仰等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则提倡通过改变诸如社会体制、分配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生产方式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宗教学在性质、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等方面也应当与一般宗教学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历史渊源上看，宗教学的创建和发展源于西方学术体系。“西方宗教学的学术体系是与其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为素材的，其对世界宗教资源的获取和归纳也与 19 世纪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及其殖民主义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立足和定位就构成了西方宗教学学术体系的特点及其学术积淀。”<sup>⑦</sup>相反，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建设在新中国创立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传统信仰和国外三大宗教为研究内容，从源头上奠定了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性质，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宗教现象，揭示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规律。那么根据该规定，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创新，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的宗教信仰情况，三是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历史和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如何结合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理论以及如何借助国外宗教领域内的优秀成果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家进行交流和往来，等等。

对于第一个方面，卓新平先生提醒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分析他们论述宗教的时空背景并且提炼出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用以指导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的构建。<sup>⑧</sup>对于第二个方面，我们仍需要积累和拓展本土的宗教学素材，利用宗教学常用的田野调研和文献比较的方法，从中国社会及其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养分。正如金泽先生的建议，应当在积累了本土学术的素材后，继续提升和凝练，结出一些中层理论的

果实，为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建设平台打下厚实的基础。<sup>⑧</sup>对于第三个方面，虽然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建设应该富有“中国特色”，但是它也绝非封闭的学术体系。从宗教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史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视跨文化比较和历史分析，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外向性和包容性，因此，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理论更应该超越其自身面向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然就整体而言，由于资料占有上的相对不足（比如翻译成果、实地考察）使我们对世界文明史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以及新兴宗教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产生不必要的文化交流障碍，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学者做出具有普世性的学术提升和理论概括。<sup>⑨</sup>

明确了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后，那么其研究内容就应该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宗教的基本要素、社会功能、发展规律和信仰对象。<sup>⑩</sup>有论者补充还要共时性地研究宗教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联，如宗教与政治、经济、哲学、道德、科学、文学、艺术等关系问题的研究。<sup>⑪</sup>当然，也还需要注意中国传统的信仰内容和特点以及无神论的必要研究。<sup>⑫</sup>日本学者岸本英夫认为一般宗教学研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科学的研究，比如宗教文化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环境学和宗教史学；另一是规范的研究，即神学和宗教哲学，神学以信仰为前提，宗教哲学以理性为前提。<sup>⑬</sup>至于岸本英夫提到的“神学”，由于西方宗教学脱胎于基督教神学，因而不少宗教类书籍会涉及上帝的讨论。中国特色宗教学虽也有神学的介绍，但多是学术意义上的“批判神学”。而“批判”不应该成为找茬挑刺的伎俩，当是学术层面的批评与判断。“批判”在哲学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需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源流、范围和界限，因而“批判神学”也应当注重研究宗教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以及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联。

通过梳理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性质、对象和基本内容，可见中国特色宗教学不同于一般宗教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1、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坚持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来探究宗教存在的现实基础；2、以解决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为前提，在扎根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需具备世界宗教研究的国际视野。虽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基于西方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土壤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

导下的中国特色宗教学却是以我国的宗教文化和宗教历史为对象来展开的具体学科，其特色和目标主要是为了分析、评价中国特色宗教和社会的关联，认识中国本土宗教存在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的中国特色宗教学既不是教人去信仰宗教，也不是教人去反对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说明、分析并解释宗教与人类经济、文化、社会的密切关联及其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注意到，宗教学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为西方的哲学社科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文化成果，而中国特色宗教学起步较晚，目前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而也迫切地需要弥补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短板，加强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政治学、宗教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运用这些分支学科丰富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相关政策

从政策层面来看，党中央一直鼓励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建设。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工作的重要批示中谈到需要建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以便对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现状和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该批示中的“宗教研究”便是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的。<sup>⑭</sup>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正标志着宗教研究的学科体制开始创立。1976年之后，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事业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支持。1979年“全国宗教研究规划会议”召开，不仅将宗教学单列为规划学科，还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并随着基础性研究成果和部分高水平的作品相继面世，中国特色宗教学研究也初具规模。<sup>⑮</sup>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正如“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同时还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清醒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决不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战略规定”<sup>⑯</sup>。

可见,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并且办好相关专业应当是我们长期遵守并落实的战略部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01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还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要坚持不懈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把宗教理论政策纳入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大局意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丰富的宗教专业知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的宗教工作干部队伍。”<sup>⑤</sup>叶小文先生对此评论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是继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之后的历史新篇。<sup>⑥</sup>该会议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及建设“宗教工作干部队伍”显然延续了19号文件指导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以及“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的战略部署。因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宗教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而宗教工作的干部和研究队伍的建设都离不开宗教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的支撑和培养。这就意味着需要办好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学专业。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sup>⑦</sup>,这为加快宗教学建设和提高宗教学地位提供了勇气和信心。2020年7月,围绕着如何“加强我国宗教人才培养”的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sup>⑧</sup>的人才标准,这说明党和政府不仅鼓励学科建设,而且还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和宗教人才的培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sup>⑨</sup>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撑,而传统文化又离不开儒释道等宗教文化的支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担主要由宗教学学者和专业人士主导和完成,他们的努力又推动着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学科发展和创新。

在中国特色宗教学发展的40年中,高校和

地方研究所陆续建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四川大学宗教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另外两个基地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认识世界各国(地区)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在各个研究所和高校研究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宗教学学术蓬勃发展,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成果倍增。<sup>⑩</sup>

但事实上,在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宗教学从业者努力克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宗教学早已是一级学科,但在“高校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里宗教学却迟迟难以升格。这与我国教育界对宗教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与高校宗教教育的认知程度有关。<sup>⑪</sup>也就是对宗教学认可度不高,同时还担心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其实,这种轻视宗教学现状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宗教学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较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于宗教学存在认识偏差。<sup>⑫</sup>

由于受到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影响,迄今为止仍有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把宗教研究误认为宗教本身,甚至认为研究宗教、学习宗教学就是信奉宗教,中国宗教学就是宗教神学,故而以教育与宗教分离为由一再反对宗教学作为一级学科进入高校。此类想法的不当之处在于:首先,从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历史、理论建设和中央政策的梳理可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指导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理论,中国特色宗教学则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审视各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处境,分析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层面的情况。其次,如果认真回顾我国的宪法规定和教育部工作政策可以发现,宪法第三十六条强调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教育政策上只要求宗教不能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制造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也只是警惕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等。未见任何一条法律和政令禁止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分析宗教问题的方法论,中国特色宗教学是指导我国宗教工作的理论课,它们不是什么神学课堂,更不是什么宗教组

织,与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冲突。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准确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了解中央精神、体味领导人的发言,而部分谈“宗”色变者显然曲解了中央的文件精神,抑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不甚了解。有鉴于此,正确领会中央文件传达的精神,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推进中国特色宗教学则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有着一定的发展历史,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福祉作为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在鼓励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推广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应该努力消除外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误解,主动引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sup>⑧</sup>的要求,引领着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道德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新篇章。

(责任编辑:展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抵制境外宗教渗透教育研究”(20BKS116)阶段性成果。

- ①⑨⑩⑪ 牛苏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州学刊》2015年第12期,第94、96、96、97页。
- ⑫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 ⑬ 学界关于“鸦片”一词的含义,可参阅王良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视域下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文本解读》(《科学与无神论》2018年第6期)和曾传辉的《从历史文化解读“鸦片”隐喻的多重含义》(《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 ⑭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362页。
- ⑮⑯⑰⑱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333—334、500、284页。
- ⑲ 参见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2页。
- ⑳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9页。
- ㉑ 冯今源:《深刻教训:苏联、东欧的宗教政策与实践》,2016年3月10日,http://www.pacilution.com/Show Article.asp?ArticleID=6645,2020年10月19日。
- ㉒ 张晓晨:《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贡献》,《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

期,第27—33页。

- ㉓ 英文为 Science of Religions,德文为 Religionswissenschaft。目前西方宗教学术界几乎不用这一术语来表达其宗教学的名称,而使用相关术语“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比较宗教”(Comparative Religions)或“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等。参见[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㉔⑮ 王泉雷、张庆熊、李天纲:《继承与超越——宗教学学科发展报告》,《“宗教、道德与大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第199、200页。
- ⑰ 卓新平:《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中国宗教学》,《中国民族报》2013年8月6日,第6版。
- ⑱ 牟钟鉴:《尊重宗教是无神论的新高度》,《中国民族报》2014年1月14日,第6版。
- ⑳ 列宁著:《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 ㉑⑳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21页。
- ㉒ 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52—153页。
- ㉓⑳⑳ 卓新平:《关于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发展的思考》,《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第2、1、3页。
- ㉔⑳ 金泽:《积跬步而致千里——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建设再给力》,《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第11—13、11页。
- ㉕ 龚学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我国的一门新学科》,《党校科研信息》1989年第55期,第13页。
- ㉖ 叶小文:《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探析》,《文史哲》2019年第2期,第49页。
- ㉗ M. エリアーデ編, J. M. キタガワ 編, 岸本英夫(監訳):《宗教学入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2页。
- ㉘ 吴云贵:《略议中国学者观念中的“宗教学”与“宗教研究”》,《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第21页。
- ㉙⑳ 卓新平、金宜久、吴云贵、牟钟鉴、李富华、郑筱筠:《对话当代中国宗教学50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历程回顾》,《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第42、42页。
- ㉚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宗教政策法规文件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26—27页。
- ㉛ 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4—396页。
- ㉜ 彭国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探索与建构——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宗教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叶小文》,《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1日,第7版。
- ㉝⑳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 ㉞ 习近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
- 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旗帜》2020年第11期,第5—8页。
- ㊱ 张志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宗教学》,《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第2页。
- ㊲ 傅有德:《宗教学是亟待补齐的“短板”》,《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9日,第1版。